

区域文化研究

QUYU WENHUA YANJIU

浙江省社科联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区域文化研究

QUYU WENHUA YANJIU

浙江省社科联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文化研究 / 浙江省社科联编.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213-03497-8

I. 区… II. 浙… III.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0685号

书 名	区域文化研究
作 者	浙江省社科联 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汪维玲 陈立影
责任校对	朱银才
封面设计	厉 琳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太众美术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46万
插 页	2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3497-8
定 价	4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浙东区域文化与浙东学术经世务实的人文精神	潘起造	1
温州生存文化的表现及成因	胡晓慧	10
浙东学术精神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杨太辛	19
浙江文化与社会发展	冯 婷	28
试论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区域表征	周晓光	36
作为区域文化之闽学的文化意义	潘叔明	45
关于闽越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	汪征鲁 薛 菁	53
闽南区域文化特征导论	陈支平 林 枫	61
南京历史文化之品格及其传承机制探析	程彩霞	71
沂蒙精神光照千秋	乔丽萍	80
论正确区分区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刘德龙	87
略论齐鲁文化的脉络、特质与影响	刘德龙 杨宗杰	94
浙商文化的社会价值	章剑鸣	101
海派文化:上海的文脉传承与时代创新	花 建	109
宁波帮与宁波的近代化事业	孙善根	117
齐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	宣兆琦	129
信任文化与农村经济行为		
——基于浙江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研究	陈立旭	137
宁波发展道路形成的文化动因	陈利权	146
“两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黄 健	154
地域文化与江西传统商业盛衰论	方志远	162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文化维度的分析	吴向鹏	176
“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		
——韦伯命题下的浙江发展经验研究	张炎兴	185
传统文化理性与浙江现代经济增长	李永刚	194

区域文化精神、“观念人力资本”与现代经济发展

——一个建立在区域文化精神基础上的内生增长模式

新思路..... 张佑林 陈朝霞 203

文化认同在外商直接投资信号博弈中的作用

分析..... 顾国达 张正荣 211

区域文化与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王立军 222

地方传统文化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以象山县爵溪镇为例..... 唐丰收 230

区域手工艺生态化保护及其社会经济互动发展策略..... 郑巨欣 239

船政文化和中国现代化..... 林 怡 249

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文化嬗变

——以安徽皖江地区文化为例..... 沈 葵 257

社会资本创新与中国现代化转型..... 王文龙 266

中国传统“和心”教育思想与现代和谐社会..... 修建军 275

晚近口岸文化的兴起与中国文化区域中心的变迁

——以王韬及近代上海新型知识分子文化的生成为

中心..... 段怀清 283

公民意识·社区文化·城市精神..... 蒯大申 295

新农村建设中村落文化的保护与创新

——以浙江兰溪诸葛村为例..... 王景新 307

徽州文化与徽商兴衰的历史启迪..... 程必定 317

浙赣文化的比较与启示..... 郭杰忠 夏汉宁 甘庆华 325

甬商与晋商相异之探微..... 乐承耀 333

长三角文化的累积与裂变:吴越文化—江南文化—海派

文化..... 陈尧明 苏 迅 343

温州与关中地区文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研究

——基于文化传统与文化维度的多框架实证比较..... 缪仁炳 353

文化是因还是果?从浙商演变看商帮文化..... 杨轶清 367

试论近代江浙农村人口流动与习俗变革..... 仲富兰 375

欠发达地区要重视和发挥区域文化的作用..... 杨宗杰 385



浙东区域文化与浙东学术 经世务实的人文精神

潘起造

【内容摘要】

浙东学术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承是植根于浙东区域文化基础之上的。古越文化中那种自强不息、励志图强的人文精神是浙东学术文化经世务实精神的根基。从与湖湘文化的比较中可见浙东学术中的“经世主义”更具有注重经济、民生的倾向；从与岭南文化的比较中也能见浙东学术中的“经世主义”在追求思想“自得”中的特点和局限。明清以来，浙东经济社会的发展，使浙东学术的“经世务实”精神渗透着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诉求。

【关键词】

地域文化 浙东学术文化 经世务实 湖湘文化 岭南文化 文化比较

【作者】

潘起造，男，1947年生，《宁波市委党校学报》主编，研究员。

经世务实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经邦济世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追求。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①先秦以后，儒家文化倡导“内圣外王”，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黄宗羲说：“儒者之学，经天纬地。”^②浙东学术文化是在古越文化根基上形成的、以儒学文化为学脉的学术文化。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由阳明心学奠基，再经刘宗周、黄宗羲传承和发展的浙东学术，虽说也是儒学文化，但更是对儒家传统的经世之学具有鼎新意义的实学文化。它一方面有着中国明清经世实学的共同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又有着浙东地域文化的思想特征。

一、对浙东学术有重大影响的浙东文化的三大传统

2000 多年来,中国文化所传承的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传统,它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浙东学术的精神当首推经世致用,各个时期的学者对此都予以肯定。黄宗羲就是以“学必原本于经术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③为治学宗旨的;梁启超认为“史学经世”是浙东学术的精神,他说:“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④陈训慈先生在《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中把浙东史学的精神概括为:博约之精神,躬行之精神,经世实用之精神,民族思想之精神,不立门户与大公之精神。

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任何一种文化精神的存在都是有其传统的。浙东学术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的形成、发展和传承可以从浙东区域文化的三大传统中来探究其来历。

对浙东学术经世务实精神的透视,首先要从远传统上看,即从古越文化来看。

经世务实作为浙东学术文化中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首先是从古越文化自强不息、励志拼搏的精神中传承而来的。

3000 多年前的越地滨江临海,全境多为草泽丘陵,深受山洪、潮汐与出没于林莽湖泽间的虫蛇兽类的侵袭为害。越至越王允常、勾践而国势日强,但北方吴的存在严重威胁着越的生存,“夫吴之与越,仇雠敌战之国……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⑤。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强国压境的生存条件,迫使越人将谋求生存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古越文化的特有品格便在这种严酷的环境局势中磨砺、孕育而出。

首先是励志图强的拼搏精神。古越初民具有一种原始的顽强不屈、好剑善斗的地域风尚。当这种原始的好剑善斗的精神被越王勾践引向战胜强敌、洗雪国耻时,便成为一种励志图强的生命力象征。这种古越之风在代代传承中凝聚为在事关民族大义时临难不苟的精神追求。宋明两朝晚期,异族入主中原、河山破碎之际;清代末叶,革命起事四方酝酿之时,浙东多殉难死节或发难倡义的志士仁人,这便是这种文化精神高扬的结果。二是具有开放和尚武的精神。越文化形成于吴越的不断征战之中,越国在越王勾践继位后,重用贤良,招揽人才,并学习楚国及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经济和国

力上升了一个新台阶。青铜器在中原多为礼器,而越人却用它制造锋利、精致享誉天下的剑戈,尚武精神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三是理性务实的精神。越地荒瘠,国小势危,但越人尊重自然规律,重视天象观察,讲究规矩绳墨,这些都直接源于长期从事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劳动经验。不事浮华,不好玄思遐想,唯重稳实,唯求解决迫在眉睫的具体目标任务,遂成为古越重要的文化品格。^⑥

鲁迅曾多次引用前人的话说:“会稽非藏污纳垢之地,乃报仇雪耻之乡。”可见,几千年来古越文化励志图强的文化精神是深深植根于浙东区域文化之中的。所以,浙东学术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在传承古越文化的优良传统中进行思想创新的,另一方面也是在摆脱其消极影响中不断前进的。

其次,对浙东学术经世务实精神的透视,还要从近传统上看,即从唐宋以来浙东地区渐趋发达的商贸文化来看。

如果说吴越文化是浙东文化的根,那么商贸文化则是浙东文化的魂。

浙东区域文化除了秉承吴越文化的传统之外,更重要的是伴随着浙东沿海商贸经济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由于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有发展海外贸易的地理优势,从而使浙东的区域文化一方面生出海洋商贸文化才有的开放特质,即开拓、自主的精神;另一方面又由于和内陆紧密相连而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注重群体、伦理的精神。因此,浙东的历史文化可以说是把海洋文化融入到大陆文化之中的沿海文化。

宁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港口的兴衰变迁对宁波城市能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宁波的海外贸易约始于秦汉时期。唐时,宁波的海外贸易发达,“海外杂国贾舶交至”。从唐宋的明州、庆元府到明清的宁波府,千余年中,宁波“为海道辐辏之地,南则闽广,东则倭夷,商舶往来,物货丰衍”^⑦。日本、高丽等国人来华,数百年间大多从宁波登岸;华人去日本、高丽等国也多由宁波放洋。宁波的这种地理条件决定了宁波人具有经商的传统,明清时期,宁波商人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大约在明朝末期,宁波商人形成了自己的集团。当时,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和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宁波地区出现了“土庶并营有无”的现象。清康熙年间开海禁,宁波“民情踊跃争奋,自近海诸岛以及日本诸道无所不至”^⑧。

深厚的商业文化积淀,使宁波人成为中国商人中的佼佼者。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宁波商帮文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现象,在浓浓的商贸文

化中,宁波人充分体现了浙东传统文化性格中那种地缘凝聚精神、自强自主精神、开拓精神和求实精神。地处浙东的温州人更是如此,他们敢为天下先,善于把握机遇,精于企业管理,能适应时代潮流,使浙东文化中的经世务实精神呈现出一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新风貌。

再次,对浙东学术经世务实精神的透视,也要从大传统上看,即由孔孟所开创、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儒学传统来看。

儒家文化在中原地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学术文化。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文化中心逐步南移的问题。晋朝时期已出现文化中心南移的现象;至五代,北方长期战乱,文人大量南下,再次出现了文化中心的南移。南宋朝廷偏安江南,完成了文化中心的彻底南移,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术文化的繁荣,形成了浙东“人文渊薮”的优势,浙东学术的文化底蕴由此而来。“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对此,全祖望颇为自豪,其曾赋诗曰:

鲒埼亭下是侬家,雪后沙螺旧所夸。

浙东列城虽褊小,风俗由来拟邹鲁。^⑨

据统计,《宋元学案》所载两浙学者中,浙东七州共 534 人,浙西八地共 146 人;南宋状元总数有 49 人,而两浙状元就占了 23 人;两宋状元两浙 30 人,合计也是居首位。《宋史》正传与《循吏传》统计两宋南方为官者以两浙最多(250 人),超出第二位的福建(124 人)一倍多;最高层次的人才是宰相,两浙先后有 29 人任相,比第二位的福建 18 人远多。^⑩

全祖望尝言:“吾乡远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阙略。有宋奎娄告瑞,大儒之教偏天下。”^⑪明末清初,“甬上当是时经史之学蔚然”^⑫,崛起了一个以黄宗羲和万氏兄弟为代表的新的浙东学派。黄宗羲“自言生平师友皆在甬上”,并说“甬上多光明俊伟之士,足为吾薪火之寄”。^⑬

浙东山川灵秀,是传承历代先贤学统和文统的学术之乡,又是“忠义之邦”。这是浙东区域文化的又一个突出的特点。

正因为浙东的区域文化有以上三大传统作底蕴,从而使贯彻于浙东学术文化中的经世务实精神既具有励志自强、关注民生的品格,也具有遵循儒道、义礼并重的特征。这可以从浙东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得到印证。



二、从与湖湘文化及岭南文化的比较中看浙东文化的经世务实精神

经世务实是湖湘文化和浙东文化共同的学术文化精神。但是,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使它们在弘扬经世务实精神中又有各自的鲜明特点。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楚文化。近代湖湘文化正是在古代湖湘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中,湖湘文化形成了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其中影响最深刻的:一是强烈的政治情怀;二是崇尚经世务实的精神。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的理想抱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明清之际,与黄宗羲同时代的王夫之以务实、主动、重行、思变的思想将经世致用推向新的理论高度。

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地域环境中的人群创造了特定的文化,而特定的文化又熏染孕育出特定的人物、培育出特定的文化意识,从而使错综复杂的湖湘文化展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由于湖南处于内陆省份,东、西、南三面环山,境内多为高山、丘陵地区,“七分山水二分田”,交通极为不便,加上一直未曾得到开发,这就使湖南人无法摆脱以农为本的思想观念的束缚,造成工商业发展相对缓慢,没有沿海城市广阔的发展舞台。从而决定了湖南人的政治意识特别强烈,追求“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境界,有强烈的参政意识。

相比而言,浙东文化讲求经世致用,除了关注政治以外,更多的是注重经济、注重民生。可以说,工商业一直在浙东人民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浙东区域文化表现出了鲜明的经济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同样渗透于浙东学术文化之中,在黄宗羲极具政治意义的《明夷待访录》中可见一斑。他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首先是从维护个人的经济财产权益说起的,他主张“工商皆本”的立论依据就在于是否“切于民用”。在他的这篇光辉著作中,讲财计、讲田制、讲货币、讲税收的内容就占了相当的篇幅。

王夫之和黄宗羲对于封建君主专制都作了尖锐批判,但两者批判的立论观念不尽相同。王夫之虽然有着“道莫盛于趋变”的思变思想,但这种“变”始终坚守在“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并肯定传统君主专

制政治的天然合理性。^⑭他没有如黄宗羲那样,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个人独裁政治制度作全面的否定;也不可能像黄宗羲那样,提出建立全新的君、臣(官)、民的关系,建立一个敢于执法、善于执法的高效率的国家行政机构的设想。王夫之和黄宗羲这两位思想大家都是非常关心政治的人物,但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却有如此差异,这显然是受不同的文化环境熏陶的结果。

湖湘文化与浙东文化的这种差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湘文化的精神激励着湖湘子弟,塑造着经天纬地之才。社会变革宛如春雨,湖南人就如雨后春笋,他们怀着满腔热情,在历史的大变革中勃发而出,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浙东文化的熏陶下,浙东人重商轻农,商业文化气息深厚。他们乐于经商,善于经商,而且目光远大。他们办实业、重教育,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使浙东地区成为近代、现代、当代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再从岭南文化看浙东文化。

岭南文化在先秦时期有了雏形。“先民居于五岭之南,在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接受了中原文化,融合成型后始称‘岭南文化’。”^⑮形成时期的岭南文化由于远离儒家中心文化,带有边缘文化的色彩。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一方面岭南文化吸收并保持了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上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和内涵。另一方面,由于岭南地区自古就是我国东南部地区手工业、小工业城镇的聚集地,这就使得岭南文化具有较强的平民倾向,充满商业色彩。

近代岭南文化精神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明朝中叶形成的岭南“江门学派”。“江门学派”创始人是陈献章(1428—1500),他的理论缘于“心学”,提倡独立思考,“凡事理求之吾心”。这是对正统程朱理学的修正和偏离,是一种思想上的大胆变革和创新。同时,“江门学派”也倡导一种比较自由开放的学风,与当时北方内地禁锢教条的学风和思维方式迥然不同。可以说,陈献章的“江门学派”开启了近代岭南自由开放学风和创新求变精神的先河。

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岭南文化能领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风骚?这与该地区的地域文化较少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束缚有极大的关系。相比之下,浙东学术文化虽然在明清之际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了重大的变革,但是从思想范畴的基本倾向上来说,仍属于儒家文化体系。这点我们从“江门心学”和“阳明心学”的比较中就可见到。陈白沙和王阳明都推崇思想的“自得”,但他俩所谓的“自得”的理想境界是很不相同的。



陈白沙为明代心学的先驱,他所推崇的“自得”是指心灵的自由、不受牵抑制累,也就是“无滞”,是一种对于超道德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这种境界的主要特点是“乐”,或“洒脱”或“自然”。显然,陈白沙的“自得”没有某种道德的约定。

浙东文化中的王阳明也讲“自得”,但他的“自得”归根结蒂是要人们依靠自己的觉悟,在心灵深处明白善恶是非,也就是所谓的“致良知”,就是遵循孔孟之道的道德良心。再来看黄宗羲的思想,他同样是以遵循孔孟之道的道德良心作为自己学说的终极关怀。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无论是对于历代君王罪恶的揭露、还是对于理想政治制度的设想,黄宗羲立论的依据始终是儒家文化的“崇公抑私”。所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虽然具有开启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思潮的历史功绩,但就他的基本政治思想来说,还不足以构建彻底否定封建政治的理论体系。不仅黄宗羲的学术思想是这样,整个明清时期的浙东学术文化也是如此。所以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华民族急需寻找救亡图强的思想武器时,浙东学术文化自然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近百年中,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岭南学术文化比浙东学术文化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三、明清浙东学术对儒家经世之学的革新以及对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明清以来,浙东学术文化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当时浙东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通往近代的商品经济架起了桥梁,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也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一些经世务实的思想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大力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具有借鉴意义,是当代浙江人民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宝贵的文化资源。比如:

在公私观念上认为所谓的“公天下”就是能使老百姓“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天下。在封建专制社会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公”是通过政权来体现的。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明后期,在商品交换的“物的关系”中使人们看到了独立的人格,从而改变了对公与私的看法。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有十分透彻的阐述,他以上古三代作为立论的依据,称“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

营者,为天下也”。所谓“公天下”就是统治者能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天下,就是能使百姓各得其私、各得其利的天下。

在经济观念上以“切于民用”而不是用政治标准,来论证“工商皆本”的合理性。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重本(农业)抑末(工商业)”作为基本国策,而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从反对“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着手,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黄宗羲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⑩以是否“切于民用”这个标准对关乎国计民生的“本”和“末”作了新的界定,在理论上说明了“工商皆本”经济观念的正确性,从而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富民”观念上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国家应以“保民”、“养民”为最高职责,在为何富民和怎样富民的问题上强调以农为本,致富的办法是“强本”、“务本”,在富民的原则上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提倡“均富”论。而浙东学派的富民思想则立足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要求:首先,他们认定“商贾”与“力田”一样都是致富的正途;其次,他们认为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夫富在编户,而不在府库”;再次,反对国家打着抑制兼并的旗号来压制、侵夺富民的财产。黄宗羲曾一再强调,解决土地问题不能“夺富民之田”,主张对富民也进行授田,“听富民之所占”,反对均富。

在“义利”观念上反对空谈义理,主张义、利统一。儒家义利观的基本观点重义轻利。“浙东之学”曾被宋代大儒朱熹指斥为“专是功利”,可见其和传统儒学思想的相左。浙东之学的“义利观”是与发达的商品经济中重实利讲功效的社会要求联系在一起的。黄宗羲进一步发挥了这种义利观,他认为孟子所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正言仁义功用”^⑪,因此义蕴含利,义利统一。他还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⑫。这是人的生存需要。所以,他认为人应尽人之所能为社会服务,同时社会则应给予相应的地位和权利。

以上浙东学派的公私观、经济观、富民观和义利观由于切合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多少年来成了工商意识发达的浙江人的文化自觉,从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传承下来,强调个性、自主、自强、功利、务实成为浙江人文精神的特质。为什么当代浙江人能较早脱离计划经济的束缚很快登上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为什么浙江地区在发展民营经济中很少受到姓“资”姓“社”

的困扰?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大风大浪中浙江人民能培育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精神?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就是蕴涵在浙东学术的“经世致用”的文化“基因”又重现出勃勃生机。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两汉之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7页。

②黄宗羲:《南雷文定》卷三《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③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一九《甬上证人书院记》。

④朱维铮校:《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⑤《国语·越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⑥费君清:《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220页。

⑦《读史方輿纪要》卷九二。

⑧姜宸英:《论日本贡市人寇始末》,见《湛园集》卷四,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⑨《鲒埼亭诗集》卷一〇、卷三。

⑩《勾餘土音》卷三《芍庭招游城东即赋东皋》。

⑪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⑫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一四《淳熙四先生柯堂碑文》。

⑬《续甬上耆旧诗集》卷三〇《黄宗羲小传》。

⑭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

⑮杨匡汉、孟繁华:《1997:“大中国文学”——香港/内陆文化的现状与差异》,载于《文艺理论》1996年第4期。

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⑰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一《孟子见梁惠王章》。

⑱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温州生存文化的表现及成因

胡晓慧

【内容摘要】

温州在改革开放走过近30个年头的今天,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界对温州的关注也发生了变化:一是对温州人的关注超过了对温州本土的关注;二是对温州发展中的一些矛盾问题的关注超过对温州发展经验的关注;三是对温州未来的关注超过对温州今天的关注。视觉的变化从本质上反映了对民间自发创新模式发展命运的一如既往的关注。本文运用文化人类学和经济社会史的观点和方法,在对当前温州经济、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简要描述的基础上,把温州模式从一种经济模式还原为一种文化模式。从长时段视角审视温州经济、温州社会、温州人构成的表象世界,考察温州模式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禀性和历史脉络,从而对温州模式和温州人的经济性格、处事行为尽量做出一种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

温州人 温州文化 台风 人口 交通 移民

【作者】

胡晓慧,女,1968年生,温州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一、引言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温州人凭着“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精神,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求发展,完成了从“生存命题”到“发展命题”的跨越,走出了一条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发展路子,从而使人们看到了民间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分工的力量、观念变革的力量。^①

如果从长时段的视角来审视温州,把温州的经济模式还原为文化模式,就不难发现,其实这是一种以“求生”为归旨的经济文化。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靠海,78%的土地是山地,5%是河流海岛,只有

17%是平原。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生存压力很大。为了生存下去,温州人不得不自强自立,不得不吃苦耐劳。由于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自身力量弱小,他们只得靠家庭家族、各种次生小团体、地方的社会网络,靠模仿、克隆、多种经营、进入门槛低的轻工产品等发展经济,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温州经济文化现象。

二、温州经济社会文化特征分析

(一) 温州经济的基本特征

在温州近30年的发展轨迹中,所谓的温州模式,无论是外在表现,还是内在特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也始终保持了一些基本不变的本质东西。

温州经济是“老百姓经济”。温州经济是一种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民本经济,有的学者称之为“小狗经济”或“草根经济”。温州老百姓的经济参与度很高,“全民皆商”的特点非常明显。小企业铺天盖地,且基本上属于家庭或家族企业,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99%,实现的工业产值占全市的96%。

温州经济是“榕树经济”。榕树是温州市市树,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具有落地生根、独木成林、多代同堂、老茎生花、空中花园和板根、绞杀等现象。这些特点与温州的区域块状集群经济和体外克隆现象极为类似。温州的小商品大市场、小产品大行业、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集聚,以及由此形成的遍布城乡的36个国家级专业产销基地和在全国各地崛起的体外“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城”、“温州工业园”等,都可用榕树的生物学特性来类比。

温州经济是“零资源经济”。温州本土可利用的自然经济资源极为贫乏,人才和技术相当紧缺。但温州人善于利用市场资源,依靠“走出去、引进来”,充分吸收和利用全国乃至国际资源,发展本地产业,做大温州经济。

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经济”。“温州人”是温州发展最宝贵的资源和最独特的优势。全市770万人中,有50多万人在海外,有170多万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创办各类企业、市场,年工业总产值超千亿元,创造了600多亿的GDP,相当于温州市GDP的60%,形成了温州市外有“市”的经济格局,

构筑起了一个庞大的体外“温州人经济”。

（二）温州社会的地方特色

作为一个长期相对独立的区域和族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温州形成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社会症候。

温州的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全市二分之一多的乡镇、50%以上的面积还属于欠发达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特征非常突出,是全省区域发展最不平衡的地方。

温州的社情民情相对复杂。20世纪50—60年代,温州是对台战争的“前线”;“文革”时期,是武斗的“火线”。改革开放初期,制假造假、走私贩私也较猖獗。现在,人口流动有“三个两百万”^②现象,中小企业量多面广,人口的大进大出和产业结构的“低小散”衍生了诸如治安形势严峻、封建迷信猖獗、安全事故不断、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

温州人的家族家庭观念浓重。宗族文化对温州人的影响根深蒂固。温州农村按姓氏聚族而居的现象十分普遍,建祠堂、修宗谱、认宗亲之风较盛。因山林、水事纠纷和“划龙舟”等活动引发的涉及多个村庄的宗族械斗也时有发生。“重男轻女”等传统意识在群众中较为普遍,温州是全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比较严重的地市之一。

温州民间网络组织特别发达。温州的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特别明显。全市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批准登记的社团有1416个,会员162万人;民办非企业单位有2332个;异地“温州商会”139个。没有登记的非正式群体如网络社团和各种协会、互助会、同年会、同乡会等无法计数。

温州的宗教问题和迷信思想比较严重。温州是浙江省乃至全国宗教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各类宗教信徒不计其数,其中基督教发展尤为迅猛。

（三）温州人的性格特点

温州的经济特征和社会特色折射出了温州人和温州文化的特点。温州人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群体,具有比较明显的双重心理特征。

温州人恋乡不守土。温州人敢于闯荡全世界,但恋乡情结重。在新居住地,就连家乡的生活方式也往往被复制了去,故在世界各地克隆出了许多“温州街”、“温州村”。一些全家已迁出了温州的温州人,也仍回温州购买房产,且不出租,一直空着,创造了一个地级市每平方米面积房价上万元的